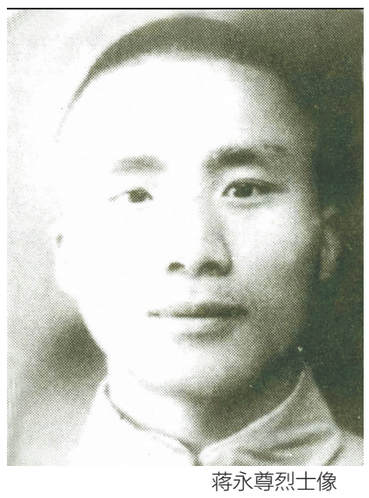
红色印记

一分的力须尽一分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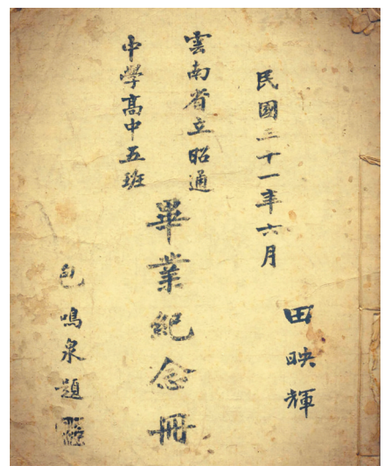
——蔣永尊烈士的读书与革命生涯

龙美光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云南的青年开始进一步酝酿着到农村组织群众进行游击战。重庆《新华日报》号召在蒋后方开辟第二条战线的社论，在昆明的学生干部中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经过一定的思想准备与军事知识的学习后，在云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7年2月开始有计划地派出第一批干部下乡。不久，6月6日（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纪念日）在滇东的宣威由蒋永尊、李祥荣、郭澜波、石飞领导，成立了第一支为数不多的秘密武装，名字就叫六六分队。在开始的几个月中，他们时出时没，或集中行军作战，露宿山头，或分散做群众工作，接近农民，学习劳动，组织秘密武装，有时打击少数的武装敌人。他们从谨慎的行动中磨练着自己，把书本上学得的八路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开始在实际行动中去领会、试验、学习和充实着自己的战斗经验。”这是华中军区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1949年10月编印的“人民政协文献”之四《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书关于一支云南地方游击武装的记述。这支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就是云南永善籍革命烈士蒋永尊。



蒋永尊烈士像



蒋永尊，字纯如，号达三，永善县桧溪人。1920年出生于一户贫农家庭，兄弟姐妹9人，排行第三。他从小性格倔强，少年时代曾因参与抗捐抗税被桧溪镇长抓去当兵。由于他坚决不从，被关进监狱，年幼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36年，他与四弟蒋永彬从小学毕业后，考入了永绥中学。1937年，他和弟弟蒋永彬一起转入省立昭通中学，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耕犁万亩实千仓，力尽气竭筋骨伤。肚贴脊梁理何在？衣不蔽体恨难忘！”这是蒋永尊从家乡永善到昭通念书途中目睹了沿途贫苦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惨景后所写的一首诗，体现了他对反动统治者剥削压迫贫民的强烈愤慨，尤其表达了对劳动大众的深切同情和关切。

在昭通念书期间，蒋永尊深受进步教师李子坚等的影响，并常与进步同学李德仁、李长猛在一起，一边共同学习，切磋提高；一边接受进步思想熏陶，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与弟弟蒋永彬还不时辗转在昭通、永善两地间，借售卖《新华日报》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

1939年，经李德仁介绍，蒋永尊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他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进步师生秘密开展党的工作。是年10月，昭通女中因校长姜勉之吞蚀书款引发学潮，蒋永尊与当地学生联名上书教育厅长龚自知，并组织停课抗议。

1942年高中毕业后，蒋永尊以小学教师、图书管理员身份为掩护，在昭通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将《整风文献》拆散后组织傅发焜、陈克祥、吴树森抄写，同时以此书为武器联系个人实际进行学习讨论。1944年，蒋永尊考入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从此便在费孝通教授等名流门下深造，同时更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多次作为云大学生会主席和省学联主席参与主持各类重大活动。

他的同宿舍同学周康（原名周朝栋）回忆：“1944年9月入学后，我和他不期而遇，我们既是同班同学，宿舍又分配在一起——南宿舍东边一间用两张上下层木板床隔起来的斗室里。从接触中感到尽管我们过去互不认识，原籍相距十分遥远，一个来自滇东北的昭通中学，一个来自昆明郊区的云大附中，但生活、学习环境大体相近，都受到一些进步思想影响，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不公所表现的富者穷奢极侈、贫者冻死路野的现象强烈不满，抱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通过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学习，来认识和了解社会，寻找改造社会的路子的强烈愿望而走到一起来了。由于有着这些共同的思想认识，我们很快便成为挚友。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人诚恳笃实，老成持重，善于团结同学，在全班十余名同学中，他的年岁稍长，我们对他以学长相待。从外表看，他经常是一身蓝大褂，一双手工布鞋，生活十分简朴，是一个典型的农村青年。从言谈中，很容易感到他是一个爱憎分明，有着敏锐政治头脑的热血青年。”

周康说：“1945年五四运动纪念日，西南联大和云大学生自治会联合在云大网球场召开纪念大会，蒋水尊在开会前做了大量发动串联同学踊跃参加集会的工作，出席大会的云大同学约数百人，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在纪念大会上，闻一多、潘大逵等几位知名教授演讲了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并结合当时沉闷的政治空气情况，号召同学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并提出对国家大事的一些主张及要求，演讲完后举行了上千人的示威游行，会后联大和云大学生自治会共同倡议，为加强校际间的联系，成立昆明市学生联合会，由全市各大中学校的自治会联合组成。这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的反共高潮之后，昆明学生以实际行动突破沉寂的政治气氛而进行的组织活动。学生们有了自己的组织，增强了进一步团结广大同学的力度，对以后的学运起着推动与领导的作用。这次五四纪念会，在云大学生间犹如向一潭死水投下一块巨石，激起一连串浪花。蒋永尊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他倡导下，以他为首的几个社会系的同学发起组织一个阅读课外书籍的读书会，取名为‘实学社’。这是一个学生公开的群众性的社团组织，参加这个组织活动的除了社会系的一些同学外，还吸收了整个文法学院其他系的同学参加，大约有四五十人之多。‘实学社’的成立，像一股奔腾的洪流，向滞泥中冲去，它鼓舞人们奋起斗争的勇气，它组织社员们阅读当时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课外书’，如‘北方文丛’的《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等描写生活在另一个天地里的人们的生活情趣、思想感情。它还组织社员们对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进行读后讨论，除了口头谈论外，还写成文字，以笔谈的形式，编成壁报《实学》，按期出版。‘实学社’成为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沉闷的政治空气里，在云大学生中成立较早，联系同学较广泛的一个群众性自我教育社团组织。”

抗战胜利后，云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开始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为此，蒋永尊积极支持1945年爆发“一二·一”运动，并以云大学生自治会干事身份，团结师生支援第一线斗争。

1946年7月11日，反动派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15日，昆明各界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由蒋永尊主持的李公朴追悼会。就是在这次追悼会上，面对特务的嚣张气焰，闻一多先生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追悼会结束，闻一多先生亦被暗杀，被特务四处搜寻的蒋永尊并没有畏惧敌特，反而更加英勇地投入反独裁反内战的斗争。

1947年2月，蒋永尊受党组织派遣，任中共滇东游击区特委书记，到宣威宝山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其间，蒋永尊也回到家乡昭通指导地下党工作，并指示牛街中学地下党员陈季伯等要建立中共镇彝威地下党支部。还说：“要在党的秘密领导下，采用各种形式，旧瓶装新酒，旧形式新内容，广交朋友，去团结教育青年，扩大党的影响。”这为昭通地下党有效开展革命活动指明了方向。

蒋永尊的进步活动受到校内外的密切关注。1947年4月21日《清华周刊》刊登的文章《昆明变了》中说，这学年“联大的兄弟校——云大，这学期自治会理事改选，居然有人公然抬出‘三青团’的牌子竞选……上学期常务理事蒋永尊同学，曾被当局再三威胁，审问，一定要他承认是‘共产党’，而且强迫他发表‘脱离共产党声明’。但他严正地拒绝了，现已被迫退学”。6月，云南反蒋武装六六分队成立，蒋永尊受命任党代表。8月，在去昆明向党组织汇报工作时被捕。他严守党的秘密，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对于多次在学生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蒋永尊，反动派早已恨之入骨。1947年11月6日，蒋永尊前往丘北创建根据地，在宣威海岱遭土匪袭击，英勇牺牲。

1949年1月，为纪念蒋永尊和在师宗县牺牲的傅发焜烈士，云南省工委决定，以两位烈士的名字将滇东北起义的几支部队合编，命名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焜支队”（1949年8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纵队第六支队）。

在1942年6月石印的《云南省立昭通中学高中五班毕业纪念册》里，石印着蒋永尊为全体同窗所写的毕业赠言：“人生是学习的过程，学习是无止境的，我们所学的东西还少，应不断的努力才是。/ 读书时坦白、真挚、和善、勇毅、进取的意识行为，今后不可一时忘却，甚而全部勾销。/ 时代课予我们的责任是艰辛的，但不能胆怯，畏却；一分的力，须尽一分的责任。如此，则由点滴而收成渠成河成汪洋大海之效。/ 求实是进步的要素，马虎是失败的象征，要进步必需求实。纯如题并书。一九四二.六.一日。”

这本同学录通讯栏的空白处，蒋永尊还为这本同学录的主人、同班田映辉同学亲笔赠言：“映辉：‘忌恶如仇’——是你的美德；‘烈火为事’——却是你的缺憾。忌恶如仇是为何？冀慎思！烈火为事是缺憾，为甚么？ 1942.6.29晨，兄永尊敬赠”。蓝黑色的钢笔字迹似乎映衬着这位乌蒙才俊清晰的面容，也似乎在诉说着有关烈士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忌恶如仇”“烈火为事”，这两句由烈士亲手写在同学录上的话，不正是他一生美好品德的最好写照?!烈士的墨迹中，闪现着他短暂而灿烂的人生之光。

书香云南

一部记录边疆思茅的好方志

——谈光绪本《思茅厅志》

郑千山

《思茅厅志》封面

中国史学传统中一般以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以及政书（典志体）四大史体作为史学的支柱，四体的互补性存在，基本解决了史学叙述上的途径问题。然而，在这庞大叙述之外，走进史学的世界，其实还有许许多多路径，在丰富着史学的瑰丽世界，比如以《逸周书》《战国策》《贞观政要》为代表的史书，以《山海经》《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天下郡国利病书》为代表的史学名著以及大量的历朝史学档案、奏议、诏令又应该归于“四体”中的哪一类呢？还有学案、年谱、地图、方志、史评等等呢？……看起来，史学的版图中，除了明晰的大“国道”外，还有阡陌纵横，网络交通，它们构成了史学大地的细节，史学机体的细胞。正因为如此，清代一代史学巨擘章学诚先生生前才发誓说，他要创造一种全新的史体来贯通史学世界的更多路径，他把这新史体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做“圆通体”。惜乎天不假年，章先生还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夙愿，就与世长辞了。

其实，章先生要创造的新史体中最瞩目的是方志。话说回来，先不说别的，在人类历史能够附丽的每一块土地上，方志或称为地方志的一类典籍，对于生活于其上的人们来说，它们是最接地气的，也最受当地人欢迎的——每个人对于生之养之的大地，其沿革如何？地域多广？气候几何？风俗怎样？有何物产？出过什么杰出人物？发生过什么大事？古物遗存否耶？——这些都是应该关注的东西。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方志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周礼·地官司徒》中云：“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其《春官宗伯》中说：外史“掌四方之志”，方志其实就是记录一个地方的“四方”之事的书，方志的渊源可追溯到《尚书·禹贡》以及《周礼·职方氏》，自汉代始，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方志著作连绵不辍，最早从仅记录一个方面的单一型方志逐步成为了综合型的方志，内容涉及区划沿革、户口、物产、风俗民情、经济发展、人物等多方面，到清代，方志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志书无论数量、覆盖面还是体例、写法，图文并茂，都处于上乘，从上到下，社会各界对方志的关注度都十分巨大。

我手里边这部《思茅厅志》影印本是云南普洱思茅区电视台记者纪梅托人寄给我的。它是光绪十一年（公元1886年）思茅同知江苏湖阳人吴光汉在道光三十年李熙龄初稿、光绪十一年九月魏锡经次稿的基础上，经过努力，与训导刘子庄及众乡绅“采访郡厅州县世事掌故”“搜录郡乘已载者，仍按条目，博访周咨，其间因革损益，踵旧增新，分条缕而供便览辑成”。据介绍，这是思茅的第一部方志，“开思茅城纂志之宗”，于斯地价值独特。

因为方志编纂的传统和方法，在江南一带早已为史界熟知，加上有李熙龄、魏锡经稿的基础，应该说这部《思茅厅志》编纂得较快，吴光汉以为，有这样一部经过鉴定比较可信的方志，对于后世了解思茅，比较方便，于是率人抄写了一部副本存于书院，也“尽善”镌刻印刷了一部分，“以待后来贤者参稽考订斟酌……聊备采择之一助云”。全书凡二十卷，包括了分野、建置、山川、赋役、物产、风俗、学校、武备、人物、艺文等等，基本囊括了思茅“四方”之事。

思茅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系雍正七年改土归流所置普洱府辖下六版纳之一，迄今有284年。1735—1913年为思茅厅，其后为县（区）。该地自明代以来就是“朝贡贸易”贡道上的重镇，熙来攘往，贸易让它的各方面发展，在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在《思茅厅志》流通以前，思茅并无方志，李熙龄初修志，大约也处于以志载史的目的，而吴光汉等后继者也终于在光绪十一年中秋之际完成了该志的重纂与流通，功德无量。

《思茅厅志》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地方，除了建置、山川、赋役、物产、祠庙、人物、名宦等等之外，它的星野资料是重要的天文学资料，祥异中有地震、火灾、冰雹的自然灾害的记录，食品中关于“茶”的记录，对于当前较热的普洱茶文化，也是重要的材料，书中对每一类物事，记录详尽，无论花鸟鱼虫，还是矿产、风俗、学校等等，都是这样。最有意思的是，它记录了思茅的方言语音，并对“土语”进行注释与解读，这是研究训诂学、音韵学和童蒙、吟诵的第一手材料；我在“历代纪事”篇中看到了关于吴三桂“大周”朝的较详细的记录，“（康熙）十三年正月，吴三桂僭周王位称周元年；十七年三月吴三桂僭位衡州伪号昭武；十月三桂死，逆孙吴世璠僭位伪号洪化；二十年二月，大师抵云南，进围省城，十月，吴世璠自杀，余党降。”虽然作为清朝的一部方志，依然称吴三桂“僭”与“伪”，但毕竟客观记录了存在了八年差2个月的“大周”朝。昆明城区至今尚存著名的“洪化桥”，这正是“大周”朝的遗存记录，前几年，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朱惠荣教授曾经对我说过，吴三桂“大周”朝的历史被遮蔽得太多，还是应该认真研究，对历史负责，何况它还存在了不算极短的时间哩。《思茅厅志》对“大周”朝的记录，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纪梅在《思茅厅志》影印本的序言中说，《思茅府志》完成后，不久就进入了民国，世事变迁，该志的流传自然受到了极大影响，知道和看到的人不多。思茅人欧阳正先生（已故）1980年初到存有该志的云南省博物馆翻印了少量该志保存，另一位思茅人雷继初先生亦并存有其中一部。今天，雷先生将该志拿出来影印，供历史学界、民族学界、历史文化爱好者无偿使用，功莫大焉！

云岭阅读

花香弥漫 艺术感人

——怒族、独龙族、普米族文学作品集《山花烂漫》读后

马玲艳

独龙族、怒族、普米族也是我国56个民族大花园里的靓丽花朵，是全国十几个人口不到10万的少数民族同胞。独龙族、怒族、普米族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主体民族，怒江州就分别设置有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和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占了怒江州的“半壁江山”，应该说，怒江州具有丰富的独龙族、怒族、普米族民族文化和文艺创作资源与人才。最近，由怒江州文联编辑出版的《山花烂漫——怒族、独龙族、普米族文学作品选集》（以下简称《山花烂漫》），就是对独龙族、怒族、普米族文学创作实绩的展示和总结。

首先，《山花烂漫》中展现了一支庞大的不可忽略的怒族、独龙族、普米族文艺创作队伍。在我们印象中，作为云南9个10万以下人口少数民族中的怒族、独龙族、普米族，他们中的作家应该屈指可数，但翻开《山花烂漫》阅读后，我们竟认识了30多位怒江籍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的“特少民族”作家、诗人，他们当中，有的创作颇丰并获得过第三、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前身)的怒族作家彭兆清，普米族作家尹善龙、尹秀龙等，其中彭兆清还获得过云南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在这群作家、诗人中，有的是在《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有影响报刊上经常发表作品的中青年作家，如独龙族的李勇、马文德，怒族的李金荣等。他们还创作出版了《诅咒崖》《老姆登》等近50部小说、诗歌、散文集和民间文学作品集。这群作家中，许多都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鲁迅文学院读过书，许多人还因为创作成绩突出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和他的诗歌作品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此刻正是仲春三月，我们拜读此书时，怒族、独龙族、普米族作家们生活工作的大怒江、澜沧江、独龙江峡谷各种各样的鲜花盛开，各种知名或不知名的鸟儿啼春，热闹非凡。我们欣赏着《山花烂漫》中这么多文学的奇花异香，仿佛置身于鸟语花香的真实境界，令人欣喜，令人感佩！在中华民族文艺百花园中，怒族、独龙族、普米族作家们培育的文学花朵，奇异而动人。

读《山花烂漫》，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怒族、独龙族、普米族作家诗人们的开阔视野和稔熟的文字驾驶能力。他们的作品题材、体裁广泛，涉猎面广。如娓娓讲述凄美爱情故事的《细雨蒙蒙》《山岚》，描述讴歌时代变迁的《走近翁里村》，赞美讴歌怒江山水风光的《撩发春风辞》……方方面面的广阔生活场景和哲理性思考有机融合，使大部分诗文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及观赏性的高度统一。特别是，作家诗人们运用的艺术体裁多样，他们或小说、散文，或诗歌，无论运用到哪种手段，都游刃有余，生活背景丰厚，艺术细节感人，值得称道。尤其是，怒族、独龙族、普米族作家诗人们基本都使用汉字创作，在熟练掌握汉字难度创作时，难度很大，还要涉及少数民族语言向汉字转化的问题等，但在这些方面，怒族、独龙族、普米族作家诗人们都做得比较成功，不论汉语语法逻辑，或遣词造句都很准确、感人。

读《山花烂漫》一书，我们强烈感受到了怒族、独龙族、普米族作家诗人们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他们的作品讴歌社会主义，唱响共产党好，弘扬主旋律，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集中的大多数作品，贴近人民，贴近生活，触向山村、厂矿、学校，触向了怒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涌现的感人故事——宁可付出汗水、心血甚至生命也要为脱贫攻坚树立革命精神的坚强斗志，面对怒江州条件艰苦、困难重重却永不言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奋斗中，怒江每天都在变化，每时都在进步，局面喜人，最终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实现了全面脱贫，走进了小康社会——对此，《山花烂漫》中的小说《身向澜沧那畔行》、散文《车行丙察察》、诗歌《信仰之光》等等，都有生动而感人的描述。

《山花烂漫》不失为一部值得阅读与推荐的好书。

读书随笔

日日有小暖 至味在人间

——读《汪曾祺散文精选有味清欢》

张帮俊

提到中国当代乡土散文作家，汪曾祺算得上一位名家。在他眼中，草木皆有情，都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在他的笔下，生活充满着乐趣与味道。正因为，因为有爱，有暖，他的人生才那样充满着清欢。

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精选散文有味清欢》是对汪曾祺散文精品的一次提炼与整理。全书分为“人间草木”“那年那些人”“随遇而安”“四方食事”“几篇小说”等5个专辑。这些文章中，有一些名篇，比如《昆明的雨》，写出了雨的韵味与昆明这座城市的乡愁。这雨是带有思念味道的，是让人念念不忘的。汪曾祺对于花花草草是有感情的，喜欢草木。因为，草木似人，是有情的。山丹丹红艳艳，花开花又落，一年又一年。春天挖野菜，那二位童心未泯的老人，一起采枸杞头，在生活中寻找乐趣，这样的生活态度，总是让人有丝感动与羡慕。

行走过许多地方，总有些寄情山水。登泰山，认识自己的微小与平常。看担山人的辛苦，感知生活的不易。桃花源里访秦人村，吃擂茶，重温世外桃源的闲致。岳阳楼上看洞庭，感范仲淹的忧国情怀，思绪飘向旷古的远方。

“那年那些人”记录了汪曾祺生命中重要的一些人与事。这其中包括西南联大的一些知名教授，比如他的授业恩师沈从文先生、非常有趣的金岳霖教授、闻一多先生。作者用很大的篇幅与笔墨着重讲述了沈从文先生的趣事，讲课趣闻。通过他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特别不一样的学者形象。《跑警报》一文，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带有趣味性的调侃，从中，我们可知，战争的残酷，昆明人，苦中作乐的精神状态。以及，中国人“不在乎”的精神支撑，文章写“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不停地在不远的地方爆炸，可他依然在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读后让人忍俊不禁，不得不佩服这位仁兄的无畏。

对于美食，故乡，汪曾祺有着深深的喜爱与眷念。高邮湖上玩，看船、看打鱼。汪曾祺对美食是津津乐道。对各种野菜是如数家珍，怀念着曾经挖野菜的快乐时光，更是回想着家乡的味道。汪曾祺不光会吃，还会做菜，喜欢逛菜市场，挑选好的食材，自己烹饪，品味美食人生。

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带给文坛温暖、快乐和不凡的趣味，在他的人生词典里，就是“日日有小暖，至味在人间。”

娜嬛撷珍

踏青诗话

刘凯

在我国，“踏青”习俗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即已出现，后成为大众化春游活动。沐浴明媚的春光，人们结伴春游，在踏青中赏春景、感春意、沐春风，观赏山川风光，游览名胜古迹，做些荡秋千、踢足球、放风筝、竞龙舟、采百草、狩猎等运动，以消灾驱邪，健身壮体。千百年来，文人墨客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踏青诗句。先秦时期，踏青活动始于春分，时人诗曰：“二月二日踏青节，群人游赏散四郊”。魏晋时，踏青定于清明前后。届时男男女女聚于水边，举行“祓除”仪式：沐浴、熏身、除垢祛病。晋代诗人张华记叙了这一习俗：“阳气清明，膏泽流盈；习习祥风，启滞导生；禽鸟逸豫，桑麻滋荣；纤条披绿，翠华含英。”

唐代，踏青颇为盛行，人们沐浴着大好春光，呼朋唤友，或到郊外游赏春色美景，或携酒相聚而饮，或探访名园，或放风筝。诗人杨巨源《东城早春》诗中写道：“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写出了当时人们呼朋引伴春游赏花的热闹场景。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诗云：“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春燕啄新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绘出了一幅早春踏青图。

宋代，踏青春游愈加盛行。诗人张先《木兰花》诗中写道：“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千游女并。芳州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吴惟信《苏真堤清明即事》诗则描绘了一幅因恋春而留连忘返，以至日暮而归的春游画卷：“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明清时代，踏青已基本成为一种“定制”。明代杨基《上巳看花次韵》诗中写道：“东湖春畔柳丝长，满苑飞花乱夕阳。何处祓除女儿散，来过流水郁金香。”短短四句，踏青场面跃然纸上。“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与朋友踏青，看到蝶飞鸟鸣，随口吟出一首《春词》：“春风、春暖、春日、春长。春山苍苍，春水漾漾。春荫荫，春浓浓，满园春花开放。门庭春柳碧翠，阶前春草芬芳，春鱼游遍春水，春鸟啼遍春堂。春色好，春光旺，几枝春杏点春光。春风吹落枝头露，春雨湿透春海棠……”全文56句，嵌入了67个“春”字，自然流畅，回味无穷，可谓描尽踏青时的美好风光。吴友如《清明节放风筝》诗云：“只凭风力健，不假羽毛丰，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是对清时踏青放风筝活动的真实写照。

春天阳光明媚，草长莺飞，在这个美好的季节，让我们纵情山水、放身自然，去愉快地踏踏青吧！